

一

劳工的苦难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当劳工的苦难经历

李青山口述 王杰整理

旧社会，我家很穷，为了养家糊口，我15岁就跟戏班子学徒唱“双玩艺儿”，走江湖卖艺求生。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艺人被称为下九流，受尽了军警官吏的欺压和凌辱，尝尽了人间之苦。使我最难忘的是，伪满时被抓“浮浪”当劳工的悲惨遭遇。

被抓“浮浪”

康德6年（1939年）夏季的一天夜晚，我和艺人付洪斌在王庆春（艺名王胖子）的戏班里，唱完“双玩艺”吃过夜饭，刚睡一小觉，想不到灾难临头了，法特警察分驻所的警察闯进屋，没容说话，就将我和付洪斌给绑上了。这时戏班里的其他人都跑了，小店主孙宝多次为我们讲情，警察说什么也不放，还蛮不讲理地给我们强加上“扰乱地方社会治安”的莫须有罪名，抓“浮浪”把我们两个押进了警察分驻所的“笆篱子”（押犯人的地方）看守起来。

在伪警察分驻所“笆篱子”里，还有一些被抓的难友，都是衣着褴褛的穷哥们。那时为了逃脱当劳工的苦役，可以求亲靠友倾家荡产借债赎买。可是穷苦人是无能为力的，我和付洪斌家也穷，又举目无亲，只好听从摆布。

被抓到警察分驻所的第二天，天刚放亮，警察就把我们五六十个难友用大车押送到舒兰县公署行政科劳务股，将我们羁

押在县监狱看管起来。每天给两顿饭，吃的是榆子面窝窝头，咸萝卜条子。

父子分离

被抓到舒兰的第三天晚上，突然，看守唤我说：“李青山，有人来看你。”我想，在县城里我无亲无故，谁能来看我？我漫不经心地走到铁栏杆前，一眼就看到我爹在铁栏外面站着。我的心像要从胸里跳出来一样，一股心酸的热泪涌出了眼窝，眼睛被泪水蒙住，什么也看不清了。我爹叫我：“青山哪！爹来看你来了。”在这一霎时，我仿佛要昏倒过去，嗓子就像被堵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有簌簌的泪水流淌着我的悲伤。我爹又问我：“你叫人抓来，到底犯了什么法？快跟爹说说。”我听到“犯法”两个字，心像刀割一样，我对爹说：“我没犯什么法，是被当‘浮浪’抓来的。”我爹又问：“啥叫浮浪？快告诉我。”我说：“就是无业游民。你回去吧，过三两天我就回去了。”我爹叹口气说：“孩子，有冤无处诉哇，有错抓的，没错放的，说不上把你们弄到哪去呀，咱爷俩这一生许是就这最后一次见面啦。”说着，我们爷俩都放声大哭起来……。我昏过去了，不知我爹什么时候离去的，我被难友架回监狱里。当我清醒过来时，付洪斌正在我的身边，劝我说：“你心放宽点吧，愁也没有用。”我想，我爹70多岁了，跋山涉水奔波了200多里路来看我，希望能把我接回家，却是带着失望、悲伤的心情离去了。当劳工是给日本侵略者卖命，中国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刺刀下，都不如一只小鸟，有多少劳工死在这些野兽的手里，我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有回路了。

第四天一早，警察把我们这些难友押送到火车站，关进了一节闷罐车厢。车厢里只有巴掌大的百叶窗，黑洞洞的，天气

炎热，人多拥挤，臭味扑鼻，憋得透不出气来。火车开动了，我们这些难友眼看就被拉走了，不知要拉到什么地方，有的放声痛哭，有的叫爹唤娘，谁愿离开自己的家乡啊！

在车厢里，只觉车身往北移动。付洪斌对我说：“要把我们拉到哪去呀？”我说：“愿往哪拉就往哪啦吧，带鼻嚼的牯牛跟着走吧，生有处，死有地，哪疙疸黄土不埋人！”

火车奔驰了三天三夜，中途不知停了几次，一路上用橡子面窝头咸菜条填肚子。终于在一个朦胧的黑夜里停下了，押车的伪兵打开了车门，大概是一个日本鬼子的翻译官大声喊道：“都听着，一个个下来，排好队！”我们一个个从牢笼般的闷罐里爬出来，借助星光看到四周群山环绕，森林密布，使我们感到阴森森的，这是一个大山沟。下车后排队点名，然后就由日本鬼子兵端着上刺刀的大盖枪，押着我们送到工棚子。

工棚子是劳工住宿的地方，全部是用草席搭成的，室内四面见光，八面透风，以土台子为炕，铺的是发霉草垫子，又潮又湿，劳工都缺铺少盖，艰苦的生活开始了。

悲惨的遭遇

我们被押送的地方叫老黑沟，位于黑龙江省黑山县境内。地处山区，山高林密，古木参天，是人迹罕见之处。把我们抓到这个地方，就是给鬼子修筑地下仓库，整天挖山洞、砸石头、背石头、挑石头、砌石头，一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早出工披着星光，晚归来带着月亮，吃不饱，睡不好，累得筋骨断，瘦得骨如柴。干活时再累也不敢直腰，谁要直腰被鬼子监工看见，就得狠狠地砸你一木剑（木头做的剑形木棍）。劳工如牛马，经常挨打受骂，打死一个劳工如同打死一只小鸡。我亲眼看见，有一个劳工活活被日本监工给打死，扔到了万人坑里。当时我们

编了一个顺口溜：

老黑沟阴森森，
周围全是山，
当中一线天；
劳工受尽牛马罪，
吃不饱来穿不暖；
鬼子好比阎王，
万人坑里把人填。

难友相助

9月份，我因过度劳累，发高烧，病倒了，病情非常严重。工地上虽有卫生所，可是不给劳工治病。付洪斌和其他难友是我的近人，看我病得死去活来，整天眼泪泡心，想给我买药买点水果儿但又分文皆无，他们惦记着我，还不顾工头的打骂，在歇气时也回工棚子看看我。有一天，付洪斌正看我，大队部通讯员来找他，让他晚饭后到大队部去，说劳工大队找他有事。可把我和付洪斌吓坏了，心里都不安起来，付洪斌晚饭都没吃，就到大队部去了。

付洪斌到大队部之后，那些狗官们对他都挺客气，叫他坐下，大队长说：“听说你会唱双玩艺，想叫你唱段听听”，付洪斌给他们唱了几段小曲《小看牌》、《小看戏》、《看秧歌》等，把大队长和大队部其他人都给唱乐了。大队长高兴了，叫他从那日起不再去工地干活了，叫他到伙房子打零杂。付洪斌灵机一动，谢过之后说：“我还有个伙伴也是唱双玩艺儿的，我们俩多年就是一副架，他还是唱包头的，是我的师傅。”大队长更高兴了，问：“他姓啥？叫什么名字？”“他姓李，叫李青山。”付洪斌回答后大队长急切地问：“是不是叫金镶玉？”“是呀”。大队

长说：“快把他找来。”“他现在病了。”付洪斌回答后大队长就叫通讯员和付洪斌到工棚子把我接去。

付洪斌被大队部找去后，我担惊受怕，病情更严重了，昏迷不醒，正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已把我扔进了万人坑里。当我清醒一些时，看到我正躺在层层是死人的骨头棒子上，我挣扎着爬起来，嘶哑地叫着：“付哥，救救我呀！救我呀！……”付洪斌真的来到万人坑，还有大队部的通讯员，我哭了，付洪斌也哭了，他跳下坑里，拉住我的手说：“你别怕，我救你来了。”通讯员看到这个场面也气愤地说：“该死的工头真残忍。”付洪斌将我背出坑，向我说了他去大队部的情景和大队长意图之后，又一直把我背到大队部。通讯员把我的情况向大队长一说，大队长说：“多险！要把狼狗放出去，也就完了。”接着叫来医生给我治病打针、吃药。病逐渐好了，我和付洪斌都在伙食房里干零活，晚上我们俩人去大队部唱“双玩艺儿”。

逃出虎口

劳工大队长、日本翻译等，为了开心取乐，将我和付洪斌都安排在大队部的伙食房干零活，天天晚上在大队部唱“双玩艺儿”。时间长了，和那些日本翻译官、大队工头、大兵等都混熟了，给了我们两人很多方便，出入很少戒备了。可是，再好也同样受着欺压、嘲弄。为了逃出虎口，我和付洪斌商量的逃跑的计划，做好了一切准备，等待时机。

新年到了，每当过春节时上边都给劳工发放一点微薄的食品，改善改善生活，可是大队部还要扣去一多半，剩余一点东西只能年三十晚上吃一顿。这个新年和过去一样，在三十晚上给劳工做了一菜一汤、大馒头。吃完晚饭，大队长把劳工都召集在一起开年末晚会，大队长训完话这后，接着进行娱乐活动，

我和付洪斌唱双玩艺《鲁达劈关西》、《李逵夺鱼》。结束之后，劳工都回到了住处（工棚子），大队头目、狗腿子、汉奸、鬼子兵又开始了大吃大喝，我和付洪斌陪着，一直吃喝到十点多钟才都一醉方休，各回老窝。在人都安静的时候，我和付洪斌按着早已商量好的逃跑计划开始行动了。当我们走到南山沟时碰上了鬼子岗哨小林，我们随机应变说我们是“戏也伊”（日语唱戏的），出去大便，这样才放我们过去，当我们走下了南山的南坡，太阳出来了，我们总算逃出了虎口。

在伪满当劳工所遭受的迫害

高俊峰

失去自由

1942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居住的西北区的王区长（王英臣）携同扶余街公所一个伪职员，采取了一种骗人的方法，到我家说是街公所找我去开会，我跟随他们到了街公所的楼上，但是屋内一个人也没有，随后过来两个消防员把楼门一关就锁上了。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已失去了自由，一想没有别的事，可能是抓劳工。紧接着接二连三的就由各区的事务员（外号叫区牙子）送来了很多人，其中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到一块一碰头，才证实是抓劳工。从下午2点钟开始，到天黑6点钟的时候，就抓来了60余人，在那个敌伪统治的黑暗社会里，正应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话。根本没有任何罪过的人，便突然失去了自由，连大小便都不自由了，央求看门的去

外边一次，如同监狱放风一样，还有人监视着，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见面。这次劳工是日本人的柜头义和祥要的，一共要了800人，除掉各村来了760名，扶余街要了40人，经过两天的时间，扶余街一共抓了70余人，在医生检查的过程中，有的托人要出去了，也有雇人替出去了，检查以后只剩下预定的数目40人，这时剩下的40人的悲惨命运已是注定了。

路途上的遭遇

我们在第三天早上，全部人员在伪官吏监视下，渡过了松花江，下午两点钟在前郭旗车站乘坐闷罐车，迈上了征途，这时才知道上密山去修火车道，这次劳工的大队长是长春岭协和会的会长初振华，大队副是李耀华，另外还有中队长纪福善等。他们丧心病狂地认贼作父，根本没有中国人味，对待劳工连牛马都不如。在火车进到某一个车站时，劳工要下去喝水和大小便，大队部的人每人拿一个木头刀在周围往车上撵，上车快的没有挨着打，上车慢的劈头盖脑就挨几下木头刀，简直人和牛马一样，真是一言难尽。在路上走了五天四宿，没有挨过打的人真太少了。我们最后到达了小密山站，下车以后，每人都背着行李徒步进山，路途之中，大队长初振华亲手制造的血腥事件发生了。

宫振海之死

在扶余街抓的劳工当中有一个叫宫振海（外号宫大个子），他是替扶余北街王花房子王风林去的，在背行李进山的路途中，由于行李重走得慢，而落在后边了，大队部的人在劳工后边，看见宫振海落在后边，大队长初振华认为宫振海有意掉队，在后边撵上去，就用木头刀劈头盖脑地乱打，宫振海虽然身上挨打，

而嘴里却是跟他讲理，但越是讲理，越挨打，后经大多数劳工讲情，初振华方才住手不打了，这时宫振海已经是鼻青脸肿了。当天到了宿营地，大家都吃饭，而宫振海却一口饭也没吃，第二天就病倒了，劳工队里虽然有随行的卫生员，但并不好好为患者看病，宫振海病了6天就怀恨含冤死去了。扶余街一同去的劳工对宫振海的死，除洒了一把同情泪而外，在背后都异口同声地说，回扶余时大家一定团结一致，同初振华斗，为宫振海报仇。宫振海死后是用火炼的，大家钉一个箱子算是把宫振海的骨灰收殓起来，由扶余街一同去的阚文臣负责经管。通过宫振海的死，扶余街劳工对初振华的不满，渐渐叫初振华知道了，这又给扶余街的劳工带来了新的灾难。

仇视和报复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当时，可以说劳动人民的生命，是在鬼子汉奸的手心里攥着，初振华因为扶余街的劳工对他的不满，他便处处找扶余街劳工寻衅。有一次他突然说，大队部的咸菜丢了，扶余街劳工住的棚子，离放咸萝卜的地方很近，初振华便说萝卜丢失与扶余街劳工有关，立即把扶余街的40人完全找到大队部，用威逼的办法拷问了一次，虽然没有逼出什么线索来，但是每个人都挨了一顿棒子。苦日子过得慢，但总得苦熬着。3300米长的土段工程，通过昼夜不停地强力劳动，在短短的31天里就完工了。在这帮凶神恶煞督促压迫的情况下，活计那样重，进度那样快，每天却是食不果腹，总是找借口不是道不好走、粮食没拉上来，就是车误点了等等，一句话，老是在劳工身上揩油，后来他们扬言，工程早完早回去，晚完晚回去，由于这种原因，大家忍饥挨饿，忍耐了一切。终于在31天里，把3300米的土段工程给做完了。

“勤劳奉仕”六个月

何汝伶口述 姜富斌整理

1944年4月，绥中县国兵漏子约1.2万人集中在城北上帝庙小学，组成“勤劳奉仕队”，并分为大、中、小队，小队下设班，每班12人，分发每人黄制服一套，水袜子一双，一付绑腿，一个小白铁碗和一个小铁盘。每中队240人，小队60人。我们为独立中队（下设4个小队），在绥中住了两宿，临行前县长刘长贵训话，大概内容是说，这次我们去兴安北省的乌奴耳修路，时间为6个月。并说，在此之先已有3个中队先到驻地安排帐篷，筹办一切食宿问题，并声称，在那里最低吃的是三号白面和文化米，说在这买1斤粮的钱，到那里就可以买3斤白面吃，并说今后虾米蔬菜等满足供应，说得天花乱坠，不过是鼓舞士气，为日本人与满洲帝国忠实卖命罢了。

第三天吃完早饭，即列队至绥中车站上车，历时五天四宿始到依里克德前面一小站下车，四外一看，山山相连，沟沟岔岔，满山都是松桦林木，山上仍见未融之白雪，周围除有军哨卡面外，不见人家。大伙见此情景不觉纷纷落泪。这是到了何种地方？有伶俐人下车后即逃跑了，下车后日近晌午不得饭吃，个个都饿得无精打采，各级队长言说，尚须再走30余公里，方可得到饭吃，于是整队爬山越沟，向西北方向深沟走去，到哈拉沟地方停下。哪里有什么帐篷？周围除高大密林而外尽是一人深之杂草，北风呼号，寒气凛凛，到了地点每人只给一小铁碗高粱米饭，够不够就是这些，人们见饭狼吞虎咽，对着空碗

泪如泉涌，哭出声来。

哈拉沟住“勤劳奉仕”队四五百人，除我们一个中队外，尚有锦县的部分人，其他中队分居哪里不详，据说山北尚有劳工。不多几天，满山沟岔均可见到白花花的席棚相继竖立起来，我们都挤在一条30米长的席棚里，睡觉都得侧着身子睡，一个紧挨一个，翻身都得起来再躺下。最先也吃过几顿白面和一些烂虾米，这也算作来时县长讲的话“兑了现”，日后则完全是稀饭，每人一顿只许喝一小碗（其中有一半谷子），中午有时吃窝头，每顿每人两个，放在手掌中一把可以攥住，可见大小，饿得人们抬不起头来，只得在外面寻些野韭菜、酸浆菜等充饥，以后这些也不准吃，说是有毒，如发现吃的就会遭一顿毒打。

我们的任务就是修路。离工棚约半公里地即为工段，原来是一条铁道线，以后路轨扒了，只剩路基，经多年山水冲击，路基全毁了，道木埋没地下，深沟断基，触目皆是，为了改建一条完好公路，必须挖出深埋地下的道木，大动土方填平沟壑。每日划分各小队之数额，必须拼命完成，完不成不准回去吃饭，或逐个挨打。各级队长和大队副官（都是中国人）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每早除在地段划出各班队任务外，其余时间拎着铁锹或洋镐把，到处溜达，见谁干得不起劲或质量不好，即给一顿棒子。前所兴隆村有个陈大开，这人来时膀大腰圆，因其个子大，排队是排头，去了不到两个月就瘦弱不堪。一日，他肚子疼，大队姓洪的副官说陈装病，叫各级队长用棒子当众毒打，陈只得承认装病。陈跟随大队到了工段，肚疼剧烈也不敢言语，中午送去的饭也不敢沾口，不到3个小时便死了。临死之前，队长见他不动还用镐把摔了一顿。路家岭一个姓王的和路连连挨打最厉害，差不多天天不知什么理由便挨一顿捶。我们还有一次埋在地上的木头没起出来，让小队长发现了，全队每人被打一

顿。再有一次是填水坑，不好修，没修完，修不好又不让走，旁边有一日本人看着，怎么办呢？有人出主意用土块往水里扔，日本人怕溅身上水就会走，谁想到泥水溅了日本人一身，把他惹火了，抄起铁锹撵着人拍，我被拍了两下子。

病号有工伤都另住一席棚，凡有病者，都得从大席棚搬出去，有病不给饭吃，打算吃饭必须硬挺着上工地（中午往工地送饭）。工伤的人也不让闲着，集中在一个火炕边上拧草绳，经过一两个月的饥饿与折磨，人死渐多，光我们哈拉沟，死人的骨灰盒就有两大排，临完时240人就死了80余人。据说大队部（驻依里克德）每天就死一二十人之多。原来席棚里挤得睡不开，两月之后松松宽宽的，谁也挨不着谁了。到了夏天多雨，外面下多大雨，棚里也下多大，行李被褥浇得透湿，人们身上害着湿疹、疥癣，躺在炕上寻思起来就痛哭流涕，真是度日如年，自己的命运还不得和装在小匣（骨灰盒）里的人那样？有一天，陈万田（本村人）悄悄和我说：“大叔，咱们躲吧！”可我寻思，咱也不知东南西北，也不知家在哪块，万一被抓回来就没命了，便对他说：“别躲吧，不是6个月到期嘛，命大就能回去，这山上狼虫虎豹样样都有，让野兽吃掉连骨头都剩不下，家里也不知道。”于是我就没走。那天又下大雨，当夜他就躲了。这雨整下了一宿。我寻思，陈万田还不得死在荒野，以后去人找也没找着。原来陈万田当夜并未走远，事后他告诉我，走到西边拐弯不敢走了，他找到一棵大空心树，钻在里面避了一宿雨，第二天鸡叫又往山上走，看到了锦州大队部的席棚，赶忙绕开，顺西梁过去，晌午走至一个破房框，原来以为有人家，近看却没有。正在这时见一劳工把头骑马过来，他躲不及被抓带到一间小房门口，把头不知进屋去干什么，他便又撒腿向深山沟里跑去，后边人撵来，他便钻进一人多深的草里，直直地躺了一天。

天黑才出来赶路，他顺着沟走了两天，遇到三个人，都是黑龙江八面城人，他没敢和这三个素不相识的人同路，便自己向西摸。饿了就吃草根、野蒜、野果充饥，走了12天才从山上摸出来，到了新工小站。正巧，又遇见那3个人之中的两个，一打听原来中途被抓回去一个，他俩腿快，才幸免。傍晚点灯的时候，他找了一家打算要点饭吃，这家只有一个老太太，是山东人，儿子在铁路上干事。他向老太太打听了火车开出的情况，当夜他便和那两个人上了火车，因无票和证明，站在门口不敢往里去，快到扎兰屯站时，从前节车来了几个日本人，陈看不好，就慢慢往后节车厢挪蹭，日本人一看那两个人，头发很长，脸上日久不洗，就知是逃跑的劳工，把他俩抓住了。陈慢慢挪到最后一节车厢时，火车停下，已到扎兰屯车站，他赶忙下车就钻进附近的苞米地里。陈在扎兰屯又呆了三四天，终不敢再登火车，便徒步而行。走了三四天，脚都起了血泡，像猪生癞一般，疼痛难忍，这时过来一牛车，陈便将真实情况告诉了赶车的老乡，老乡同情他，让他乘车一直到了泰来县。他在泰来东肖家窝堡对李洪钧说：“好歹，给我点饭，就在你这儿扛活吧。”为此，陈便在李洪钧处扛了二年活，直到解放才回到家乡。就是这样，陈万田历尽艰险始炼了一条性命。

6月间，绥中县长刘长贵及县里几个大官曾带了黄瓜、豆荚去乌奴耳一次，那天，天气暴热，他把人集合到操场训话，大意为“你们吃不饱，饿这样还行？哪管全县人不吃，也得想法子给你们送。我回去后三天一次给你们送咱绥中黄瓜豆荚。”说完，每人发了几条黄瓜，记得在讲话时，当场就有多人支持不住，倒地昏厥。以后照常三碗稀粥，县长的话等于放了一个响屁。

“勤劳奉仕”队的生活管理也是异常严格，一切得听号音行

动，天亮起床五分钟内即要求一切动作完毕（穿衣、叠被、打腿绷），谁最后出屋便是一顿棒打，被褥要求叠得四楞四角，不合格者也享受一顿棒子，出操完全用日本话喊口令，有时跑步，有时练正步、齐步，或作体操，约操练半小时，然后洗脸吃饭，开饭前先把个人的碗筷摆好，每人站在饭碗前唱歌，唱罢须向饭行礼才许动筷。饭毕要把自己的碗洗净扣在行李头前。接着便是作业，中午吃饭都不回来，伙房将饭送到工段，日落回来照例唱歌吃饭，有时饭后也得坐在席棚或集合操场唱歌。

9月份某天，小队长说把工具都拿到河里洗干净。大伙就猜疑，可能苦到头了，没准让回家吧。以后又将铁锹洋镐都抹上豆油，用草绳捆起来入了库，我们小队只留下两把铁锤，大伙就用铁锤在路面上打打石头，干些零碎活。第五天头上，才说明天休息一天，送大伙回家，大家听此消息高兴得乱蹦乱跳。每人发了12个小馒头，在依里克德上车。12个小馒头哪里够吃，路上又不许下车买东西，饿了只好生吃每人发的2斤小米粒子。9月17日到了绥中，仍集结在上帝庙缴了衣服、饭碗，这才各自回家。

到家后我大病一场，一连两三个月没下来地。母亲自我走后，哭坏了眼睛，落下残疾，至今未愈。我能活着回来，还真算是命大了。

出劳工给我留下了终生痛苦

孟庆祥口述 李泰郁整理

提起“满洲国”出劳工的事来真叫人痛心。那时候日本鬼

子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只当牛马使用。加上一帮汉奸、官吏们当帮凶，出劳工的穷人是沒有活路的。他们口头上说：人口多的要出，哥们多的要出，有钱户要出。实际上无论人口多少，让谁出就必须出，甚至和地方“头行”不睦的，老婆被看中的也逃不过，就连光棍一人没家没业的，也给你安上个“浮浪者”的名义把你抓去。人家有钱的既或摊一个，可以雇穷人顶，有势的和官家有点联络的，根本就摊不上。总之，最倒霉的是穷人。

康德10年我43岁，住在吉林省桦甸县桦树林子村。那时候家里6口人。有我弟弟庆林，有前房老婆扔下的3个姑娘和新续娶不到4个月的“老伴”，我们哥俩只种30亩地，生活很困难。

当年9月的一天，村公所给我下个通知，叫我家出1名劳工，时间是6个月。我和弟弟先前打算跑出去躲躲，后来想到，凡是有家有业的没有躲过去的，还得找点苦吃，轻则打一顿，缴了国民手帐，重的给你安个反满抗日的名堂，把你送官治罪。无奈，只得我去出劳工了。

这次我们屯去了7个人，全村100余人。往县里送的时候，有村上的劳务系长跟着，还有警察扛枪押送。到县住在劳工店，怕时间呆长了出事，第二天每人发了两个窝窝头，就把我们用带篷子的汽车送到磐石县。经过日本人检查身体以后，正式编了队。我编在第一中队二小队一分队。当时，怕我们劳工逃跑，都互相打了连环保。晚上集合起来，队长拿着棒子在这两旁看着，劳工站队在中间走，把我们带到车站，押上了盒子（闷罐）车，一车坐50人；有小队长看着。火车经过延吉、图们、牡丹江、鸡西，又走25公里到平阳车站下车。

平阳站在三江省（现在黑龙江省）东部，离国境线不远。这地方有日本兵驻扎，距此不到3公里，有飞机场。我们的任务就

是在车站卸火车、装汽车，给日本鬼子搬运军用物资、修路、修仓库。据说我们这里后勤，是上等差事，若在前方修工事那苦处就更大了，可是我们的罪也够受的了。

住的宿舍叫劳工房子。是就地挖土堆成的墙基，上边用木板子夹上，中间装上土做墙，房盖是木板钉的，上边盖一层席子，里边搭的是板炕，冬天虽然生个炉子，地下照样上冻。睡觉的时候，下边冻上边冷，冻得直打哆嗦，连腿都不敢伸，一个个像缩脖鸡。一觉醒来，冻得腰硬胳膊腿疼，下地得扶着床溜达，不然都迈不开步。

吃的是一天给一斤二两八钱粮食。品种有苞米面、橡子面和高粱。早晚每人两碗稀粥，午间每人两个窝窝头。饿得不行时，个人的一点出路就是在扛豆饼时掰点豆饼渣吃。活计累，吃不到有营养的东西，人都瘦弱不堪，病号一天比一天多。

病号和劳工一样吃不饱饭，可是在仓库附近的大米撒的满地都是，也不让动一个粒。“太君”来检查的时候，他们把米扫在一起挖坑埋掉，一次就有五六石。

日本人特别提防劳工，怕偷吃的。每天到仓库做工时，早、午、晚严密搜身三次。一不准带火，二不准带出仓库内的任何东西。有一次，一个劳工由于饿得不行了，在仓库拿了一个罐头，回来被搜出来，日本人将他当场打了一顿嘴巴，并集合所有劳工，当众把他绑在柱子上，要用刺刀捅死他，还说扔到洋狗圈去喂狗。把大伙都吓得不得了，后来大伙一齐给他求情才算把他放了。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听说乡亲来慰问我们送来不少肉、酒、面。只在三十晚上每人分了十几个饺子和几块野猪肉，可是，大部分好东西都归了队长一伙人，他们的小伙食一个月也没断吃香的喝辣的。

我们穿的衣服都是个人带的，大部分破破烂烂。由于北满天气严寒，临来时给每人特殊发了一件粗布大衣。平时穿的衣服，直到破得实在没办法遮体时，才又发了一件棉袄。

去干活的时候站着队，由分队长领着，工地有日本兵监工。看谁不顺眼，不分青红皂白就痛打一顿。打人的名目很多，有时站上队打连串嘴巴，从头打到尾一个不剩，有时还打“协和嘴巴”，你打我，我打你，鬼子站在一边笑。

冬天不管怎么冷，天一亮就起来跑步、下操。报数、喊口令都是日本语，不会就得挨打。走路时还得唱日本歌，什么“米要倒，卡一闹，烧拉阿开得……”劳工无论在什么地方见了日本人和队长都得打立正（行举手礼），晚上睡觉以前，日本人还到工房子去“点呼”（即点名），劳工都得跪在床上听着。不用说干活，就这一套就把人折腾得要死。

对有病的劳工更是残忍。轻了你得照常干活，一倒在床上就说你是传染病，把你弄到病号房子去隔离，隔离没人照顾，九死一生，死了就往外拽。我到平阳以后，由于冻、饿、累、气，不到一个月就病倒了，好险死在那里。当时多亏同乡李春山热心照顾我，从仓库捡大米粒，冒险用裤腰沿子往回带（检查时再漏到裤角去），偷着熬粥把我喂活了，因此我们俩还结为生死弟兄。

劳工死了不装棺材，用火炼完以后把骨灰装进木匣子里。后来日本人嫌炼的人太多，叫几个死人中炼一个就行，把一个人的骨灰分装几个匣子里，说这样省事。那一次我们一起去就死了6个，其中就有我们村头道沟的邹连太。在工地附近有个叫王八脖子的地方，那里是炼尸场，在一个庙的附近，劳工的脑骨一堆一堆的，像葫芦头子似的，真叫人心酸。回来的时候，九台县有个劳工死在火车上，当时大伙没敢声张，用衣服盖起

来，直到车进了站才说，然后抬下车去，不然日本人知道了，早给扔下车去，连尸首也带不回来。

我这次出劳工一直到第二年3月29日才回来，共干了7个月。回家时瘦得不像个人样了，进门时连我老婆都不认识我了，经过一年多的调养，病虽好了，可是两条腿落下了残疾。想起当年当劳工的痛苦，我痛恨日本鬼子，痛恨旧社会，这是旧社会给我留下的痛苦，使我一生难忘。

(政协桦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供稿)

一个被征劳工的自述

林树桂

抛妻离子被征劳工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大量征抓劳工，征抓劳工有几种方式：有的组成所谓“勤劳奉公队”，俗称“国兵漏子”，即抓伪满征兵检查没有合格的一些人充当劳工；有的组成所谓“勤劳奉仕队”，即在学的各校学生或机关职员临时派作劳工；有的是从居民中被普征作劳工的，即一屯一甲按户均摊，每户摊派1名劳工。但有权势的，就可以不摊，借口是作了保甲长，已经给公家当差，就算出劳工了。至于有钱的地主们，可以雇人顶替当劳工。因此，被抓做劳工的，就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们。我就是这样一名被征的劳工。

我住在吉林省伊通县大南村，当时家中有老婆和5个孩子（4个女孩、1个男孩），大的十二三岁，小的将满1个月，全家7口全靠我一个人作木工维持生活。在伪满康德6年（1939年）

2月，村长李子新通知甲长赵文让，指名我已被征当劳工，并限令在3天以内立即起程。并规定要自己携带行李和碗筷，30斤高粱米，一二斤咸盐，还带25元钱。工作时间说是6个月（后来又延长24天共6个月零24天）。大南村四五百户人家，此次被征做劳工的有50余人，大约每10户征1名。得信后，我们一家老婆孩子哭了3天。到二月初十前后，已有300余人都在大南村集合，住了一宿（住在大车店，伙食自己吃自己做）。然后这300余名劳工，经过点名，排队后，由村长李子新讲话，大意是说：“你们这次被选作劳工，是到国境线上，去建设国防，是很光荣的。公家照顾你们很周到，一切衣服行李携带少的人不要紧，公家有，可以给你们用，每个人还发给你们一双水袜子（但是后来其它什么也没给，只是每人给一双水袜子）。”大家一齐坐着铁轮大车到了伊通县。

各地送来的劳工集合在一起，已有800余人，每人发给一个袖标，在袖标上写上姓名、番号。这800余人编成一个大队，有大队长1名（伊通县里派来的）、翻译1名。大队以下有4个中队，每个中队300人左右，有4个中队长；每个中队又分几个小队，每小队约五六十人，每个小队有小队长1名，这样就便于看管监视，主要是严格地防止劳工们的私自逃跑。

大队编成后，乘上载货的汽车，到了伪满首都新京（长春）。下车后，住在车站附近的悦来栈。不准出院，家人来也不许接见。把守大门的是日本军人，全副武装，气势汹汹，两人一班轮流看管，看管得很严。到了2月十几，由伪首都出发，把我们装上专用铁棚列车（就是有门、无窗，俗称“闷罐”的）。这一列“闷罐”车，大约装有1800余名劳工是一同开往密山国境线的。每一个闷罐车有6个日本兵监视劳工的行动，小便时把车门打开一齐小便，大便时必须到车站，车停后，先由两名日

本兵下车持枪监视着。在车上坐了三天两宿，一口水也没喝着，只是每人每顿发给一个面包，在口渴舌干的情形下这个干巴面包也是难咽的。

犬马不如的“囚犯”生活

我们乘着专用闷罐车直达伪东安省会密山。到了密山以后，每5个人照一个像，用连坐的方法实行五人连坐，一人逃跑，同受株连。这种方法是很毒辣的。专用列车一直开到一所大仓库里下车，通过仓库便是专为拘留劳工的房子。这所房子在南北长约半公里，东西约半公里的大院内，院四周设有铁丝网和电网3层，防守像监狱一样。院里全是席棚，盖起12栋住房，每栋20间，每间里都住得满满的。无论睡觉、吃饭、休息乃至养病都是在这席棚里宽不到半米的床铺上。这种床铺是用砖砌的，不烧火，当然又潮又凉。劳工们睡觉是侧身而卧，翻身是很难的。如果有的劳工夜间小便，转瞬间自己所占有的半米多宽“地盘”，就会被邻人占领，只好上床重新去挤，但已很难恢复原有的位置。另外有4栋席棚是专门给被俘的“红军”（当时大家称“抗日军”为“红军”）准备的。当时共住有“红军”200余人，对他们监视得更严。

我们每天早4点起床，5点吃早饭，中午11点半吃午饭，晚5点吃晚饭。每当吃饭时，劳工们每人拿着自己的小碗，到厨房门前排队。厨房是在另外一栋大房子里，按顺序进屋，每人发给一小碗饭，一小碗汤，饭有时是高粱米加黄豆做成的，1小碗约3两左右，有时是1个窝窝头，是苞米面内掺橡子面做的，约4两左右。汤是白水加上一点蔬菜，汤多菜少。饭和菜领完后，劳工们一手端饭一手端汤拿回宿舍自己所占有的半米多宽的床位上去吃；但有人在返回宿舍的路上三口两口就把饭菜都吞

吃了。

每天早晨吃饭以后稍事休息，就整队集合进行“朝会”，朝会时由劳工们在院内排列整齐，听日本人的口令。先升起伪满的“国旗”，在升旗的同时，就一同唱起伪满“国歌”。“国歌”唱完，“国旗”也升到了顶端，即向“国旗”敬礼。然后再向日本东京皇宫遥拜，向长春伪满帝宫遥拜，向建国忠灵庙遥拜。这样一拜再拜，工人们是一边拜一边偷偷地骂着。拜完以后稍事休息就开始了每个人的劳动。

在这里的劳工们，都是按照各人不同的情况，做着不同的劳务，大体说来，有木瓦工、铁工、汽车修理工、铆焊工、裁缝工、食品工、装卸工、饲养工等几种。这些工人都是在固定的厂子里或指定的地方做活。还有一些普通工人就是随时做些挖壕、修道等各种零活，那是要临时听候分配的。我是被分配做木工的，在木工厂里做活，一天忙个不停，厂内有日本监工，监视很严。工人们每天出入工厂，都必须受厂内的日本人严格检查，从头上一直检查到脚下，从衣服里面到帽子中间，都得经过详细检查；女工由日本女人检查，男工由日本男人检查。

工厂除男劳工厂外还有女工工厂，厂内约有六百多名女工，专做军用被服和拆洗等活计。

在这里我想起一段人不如狗的生活情况。就是在这里的日军养着许多军用犬，用专人来喂养，当时称之为“狗仆役”。这些军用犬比我们工人高贵得多。每个狗仆役喂养5条狗，每条狗住一铺火炕，就是狗仆役也借狗光，住上一铺火炕。每条狗每天吃3吨饭，洗1次澡，并且经常消毒，还要由狗仆役领着到外面溜达一次。狗每顿一桶饭一桶菜，饭是大米饭，菜里有一半肉，狗仆役每天把饭菜挑来分给5条狗，自己也分一份与狗同吃。这在其他工人看来，都说狗仆役借了狗光在天天过年。但

是充当狗仆役的人选条件是很严的，必须年轻力壮、健康无病、经医生仔细检查合格后，还要洗澡，剪手脚指甲，并加消毒，然后穿上白衣服，由日本军官引导与狗相见。

因为我是一个木工，时常到狗房去修理门窗、器具等，大约在每月里总会有一二次。经过石灰槽消毒后进屋里做工，所以了解一些情况。

惨不忍睹的虐待暴行

日军的伤病员，需要大量各种血型的血液，这些血液也要从劳工身上输出供给。所以日本侵略者不但剥削工人的劳力而且吸吮工人的膏血，像我们这些劳工们，本来营养不足，吃不饱、穿不暖，每天饿着肚子怎能再输血呢？但是每个劳工平时检查出来的血型都有记录，大约每两个月要输血1次，输血后仅给3个鸡蛋。

对有的劳工生了病，日本侵略者也有虐待的方法。就是如果请病假，他们就说是装病，叫病人跑圈。其实日本人也知道有病，这样做是来个下马威，工人以后有病也别请假，请假反要受罪。有一次，一个病人带病跑步，日本人围一圈，每隔十步左右站一个日本人催促着快跑，跑慢了就打。这个病人实在跑急了，一头碰在电网上触电而死。日本人反而哈哈大笑，以为以后就不会有人来请假了。

距离工地约七八里路的北边山麓上，有个叫“炼人场”的地方，工人们都叫这个山是“炼人山”。这座山平时成为禁地，不许任何人去看。但可以遥遥望见：每隔几天就冒烟一次，冒烟的日期必须是无雨的南风天。下雨天不能炼，因为怕火被雨烧灭。北风天也不能炼，恐怕北风把炼尸的气味吹到工地，工人们闻到炼尸的气味，将会起副作用。每当炼尸的时候，这个

禁地只准派去炼尸的人入场。据曾经参加炼尸的人说，每次炼尸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个，以至十数人，被炼的尸体都是各种原因死的劳工们。把所有尸体堆放在一起，架上干柴、木柙等，点火燃烧，当时青烟飘渺，火光烛天，这些含冤屈死的工人背井离乡，竟是这样化为灰烬。炼完后，由炼尸人拣出骨灰。本来在开始炼时，尸体都堆在一起，炼完以后，就很难分辨为某人的尸体，可是为了骗人，由炼尸人随便拣出，说这骨灰是某人某人的，就装在贴有某人姓名的骨灰箱里。也有时捡到木灰当作骨灰装在箱里。工人不但死得屈，骨灰被装也得屈，真是冤沉海底无处诉了。在我们队中，曾经死了两个人，也是这样装上骨灰箱，由我带回伊通县的。

我们在工地上，病轻的固然得干活，病重的转到病房也等于死。如有个工人被日本侵略者认为偷了面袋，就对他拳脚相加，暴打一顿，送入病房没过三天就死了。又如，有人抬运木料，把中指压扁了，医生不给治疗，他哭叫了两天两夜，居然死去了。无论是怎样死的，都送到北山炼人场去炼，在工地每月大约死二三十个人，在6个月内死的约有一二百人，因为我是个木工，每月都要做骨灰箱子二三十个，做出的骨灰箱，都拿去装骨灰，没一个剩余的。

日本侵略者在工地上经常随便打人，摸起什么就用什么打，没头没脑地打，不管是头、脸、腰、腿碰哪打哪，打死的也送北山炼人场。

死里逃生 幸运归来

当初我被征的时候，听说要到国境线去做劳工，心里很没有底，自己想到以前听说有很多劳工到国境线上修筑工事，很多人都没回来，据说是让日本人活埋了，因为国境线的工程多

半是军事上的一些秘密工程，日本侵略者叫工人修完，恐怕工人传出他们的秘密，所以工程结束了，工人的生命也结束了。因此当我们出发以后都是这样想，也有的偷偷地在闷罐专车上私下谈论，大家都认为此去是九死一生，都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可是，我终于在受过半年多的灾难以后，又回到故乡，这怎能不说是幸运呢？这是因为我这次被抓劳工还是在前线上的后方，不然就不会有这样的幸运了。

(长春市政协文史办公室记录整理)

劳工血泪

于洪乔

庆安县出劳工是从康德7年（1940年）开始的。自此以后年年摊派劳工，而且是逐年递增，仅大罗镇一个乡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不足6年时间，全乡出劳工达1058人（次），各个年份出劳工数分别是1940年5人，1941年12人，1942年34人，1943年256人，1944年709人，1945年8月前42人。其中1944年曾3次要劳工。

七道岗有个叫张录的农民，在1943年去劳工刚回到家，他弟弟又被指名去劳工，恰在这时他弟弟突然得暴病故去。警察所见张录的弟弟没按时报到，照例闯进张家抓人。当警察亲眼见到停放在地上尸体时，把脸一翻说：“凡是指名的劳工，在册的难逃，弟弟死了还有哥哥呢！”黑心肠的警察狗子，不顾张家苦苦哀求，丧事无人料理，硬是把出劳工刚回到家的张录，用绳子捆绑起来带走。就这样张录又替死去的弟弟，第二次去当

劳工。

劳工被押运到服苦役的工地，就像坠入了人间地狱。曾去孙吴当劳工的苗玉春回忆说，劳工生活太悲惨了，他们一齐从庆安押到孙吴当劳工，主要是给日本兵搬运军需物资，有的人是修筑工事。运物资，每人负重30余公斤，路程是30公里，上午去下午回，而且是来回载，每天背着这30多公斤的物资，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完60公里路。劳工们经受不住长期连续高强度体力损耗，饥饿、劳累折磨得人人面黄肌瘦，虚弱无力，走路都打晃。甭说背负重载，即使空手日行60公里，也难于支撑得了，尤其是盛夏酷暑季节，背着重载爬山涉水，实在迈不动脚步，想喘息片刻，监工就说你是有意“泡蘑菇，磨洋工”，扬起皮鞭狠狠抽打你。劳工们只得咬紧牙关汗流夹背地任人像牲口一样驱赶着。常有人坚持不住晕倒在山路上，有的栽倒在那里就再也没有起来。

有一次苗玉春和苦难劳工兄弟们把物资背到指定地点，一路上饥饿、劳累，再也没有力气把同样重的物品背回原地，他斜躺在工棚外歇气时，瞧见马料缸里，有冒着香气刚出锅的料豆子，他真饿急了，肚子咕噜直叫。他下意识地走过去，抓了一把马料，刚按在嘴里，就被日本兵发现了。凶煞似的日本兵不容分说，上去一脚把他踹倒，接着一顿乱棒劈头盖脸朝他打来，苗玉春被打得伤痕累累满地乱滚，多亏众位劳工弟兄苦苦哀求，才算大难不死，拣了一条性命。

劳工们的穿着更是破烂不堪，原来带去的旧衣服，又经长时间磨损和风吹、雨淋、汗浸，已成破布片子、碎布条子，有的赤身露体，就拣个旧灰袋子、破麻袋片或草帘子围在腰上遮羞，鞋底磨破用绳绑上，有的人没鞋穿，脚扎破了，流着脓血光着脚板在铺满荆棘碎石的山路上跋涉。七道岗一个外号叫魏

大花园的劳工，下身没裤子穿，围一条破草袋子出工，腿部被草袋子磨破了，皮肉溃烂，久不愈合，膝盖骨都露出来了，监工仍不允许他歇工医治，继续一瘸一拐做苦工。

当劳工，夏天不好过，冬天更难熬。无情的严冬，刺骨的寒风吹进四面透气的冷棚子里，冰天雪地，棚里棚外一样冷。夜间单薄的破被不能御寒，冻得手脚抽筋。在数九隆冬，冻伤的，冻掉手脚的，冻僵、冻死的几乎天天都有。劳工棚内像一座活地狱，寒冷、劳累、饥饿把人折磨病了，不仅得不到适当休息和治疗，还要减少伙食定量。到孙吴县出劳工的一旦有病，就一天少给一顿饭，每顿饭只给一碗稀粥，这样轻病也被饿成了重病号，劳工一转成重病号，很少有活着回家的。劳工为了能活下来熬到和家人重聚，染上一般疾患，都勉强挣扎着出工，宁可累死在工地上，也不愿当病号在工棚内等死。但由于劳动生活条件极端恶劣，劳工很难逃脱厄运，每至严冬，都有大批劳工死亡。曾两次被强迫出劳工的张录说：1944年去黑河神仙府修机场，庆安一共去了307人，干了5个月苦工，活着回来的仅有68人。那些人除少部分逃跑的以外，其余都是在劳工工地被饿死、累死或病死的。劳工死在工地，被拖到荒郊野外就算完了，甚至有的气还没有断绝，在重病昏迷中就被扔到乱尸岗子万人坑里。

劳工们为生存下去，脱离劳工工地，曾发生过多起逃亡事件。在孙吴当劳工的就常有冒死逃跑的，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多数逃亡劳工都未能逃出虎口狼窝，反遭杀身之祸。因为孙吴劳工现场在荒山野岭中，百里不见人烟。逃亡的劳工，山路不熟，腹内无食，体弱无力，奔波数日出不了山。日本兵和监工发现劳工逃跑，还要派出人马四处逮捕。因而逃跑的劳工即使不被捉回，也多被累死、饿死在逃亡途中，死里逃生的寥

寥无几。劳工逃亡一旦被捕捉回来，就要被日本兵当众处死，以镇压劳工。苗玉春在孙吴当劳工时，他的干兄弟“五七十子”，就是因为逃跑未成被抓回，倒吊在梁柁上，被日本兵推拥着往墙上撞，活活把脑袋撞碎。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那些遭受万般劫难，侥幸能到期活着回来的劳工，也是伤残者居多，有的回到家长期不能从事劳动，有的成为终身残废。元宝沟马大结巴，1943年冬在孙吴当劳工时，冻掉了双脚，变成了残废，回家后因丧失劳动能力，沦为乞丐，沿街爬行，乞讨为生。

在灾难深重、国破家亡的伪满洲国时期，多少劳工在侵略者的皮鞭驱赶下，背负着沉重物资栽倒在边塞山路上，阴森的矿井里，多少劳工在饥饿和病痛呻吟中被填进沟壑里，多少劳工历尽磨难致伤、致残、致死下落不明，村村屯屯到处都有劳工的苦难史，记载着劳工的血和泪。

（摘自《庆安文史资料》）

给日军当劳工的苦难岁月

孙同修口述 刘翰章整理

我1920年生于山东省鄒城县的一个农村。8岁死了娘，跟爹来关外辽宁省昌图县。我给地主放羊，爹在西丰煤窑挖煤，父子俩相依为命。

1935年初，父亲在煤窑干活累死了，当时我16岁，只身一人，流浪到沈阳市，在皇姑屯日本人开设的冶炼厂当工人，一天挣6角钱。

半年后，几个人贩子到沈阳市大街上招工。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我心活了，就跟着招工的来到黑龙江省孙吴县修日本兵营。天天挑土篮，干了几个月，完工时只发给5元钱，被送回沈阳市。回来后，生活无着落，1936年又随招工的去海拉尔日本仓库当装卸工。又是光干活不给钱，到年底不用了，又给送回沈阳，共计给了20元钱。

1937年春，沈阳街里出现了几个带红胳膊箍的招工人，说：“一天开2元钱的工资”，我想，这回可差不多，又报了名。谁知又上当了。招工人预支給5元钱，就把我领进一个大院，外面有人把守。头几天人不太多，20天，就招了四五百人。招工人就把我们带到沈阳北站赶进了“瓦罐”车。一个车厢挤110人，封上门，吃、喝、拉、撒、睡全在车上。走了7天7夜，总算到了虎林县城（虎头），下车一看，到处都是荒草甸子和大山，来来往往的日本鬼子押着一群群劳工，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们排着队，向东走了二三里地，到了小南山（如今的小白塔山）的工棚子，这就是我们的住处。工棚一排18栋，全是苇席棚，每个棚子住200人。1到17号工棚，共有3500人，18号工棚是专为病号预备的。靠近工棚另有一座草木结构的帐房。住处四周是用铁刺线圈成长方形的圈子，防备劳工逃跑。

二柜的把头姓单，大高个，水蛇腰，总瞪着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经常身穿三紧皮夹克。会用日本话给日本鬼子溜须，也会用日本话骂中国人，动不动就用镐把打人，我们叫他单大马棒。每个工棚里都有他的心腹当监工，和劳工住在一起，监视、督工。

我们的上衣背后都缝一块半尺见方的白布，上面画个黑圈，写着“苦力”、“木工”、“石工”、“镐夫”等字样。如果没有这个标记，即认为是苏联间谍，抓起来。上下工，都在监工带领

下，排着队走，不准单独行动。上工点名，中午饭在工地吃，看得很严。

工地在小南山（今虎头的小白塔山），地处中苏国境线，是日本关东军进攻苏联的战略要地。因此，日本人要在小南山和北部连绵起伏的山中打一条隧道。工地有很多处，小南山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究竟有多少劳工干活，工程全貌是什么样，无法知道。因为所有劳工都是在日军枪口下，只能低头干活。我们这3000余人，分布在几处，大部分在小南山底下掏洞子。原已开出了洞口，我们接茬向前掘进。每班100余人，昼夜不停，一天一宿只能掘进二三米。挖到一定程度，就架钢筋，用混凝土浇筑。一部分人修地下弹药库。共3个库，每个300平方米，都与隧道相通，通道2米宽，1人多高。一部分人在小南山附近修大炮座。3个炮座都是10米的基础，还有一部分人挖交通壕。

工地上除修洞子有两台搅拌机，其余全是用人工。在棍棒下挑、抬、挖、掘，干一天累得精疲力尽，而且睡眠不足。每天早5点监工就用镐把敲得床沿叮当响，劳工立即穿衣裳，稍一迟缓，就是两镐把。有一个劳工被打了两镐把，仍没起来，上前一扒拉，人早死多时了。

我们从来到走一年多，没吃过一顿蔬菜，顿顿是就咸盐豆，喝馏锅水，不论冬夏每次开饭，都在工棚子外面。

至于穿的，每年发一套单衣、一套棉衣，全是更生布。棉花像灰毡子一样，絮的棉衣一块薄、一块厚，都滚了套。为挡风寒，我们把水泥袋子套在身上，缠在腿上，当衬衣衬裤。一年发一双后开门的胶皮水袜子，经常是前面露脚趾，后边露脚跟。

工棚子是用四层席搭的马架子，两头开门，两边用小木杆搭成通铺，铺上草。夏季闷热潮湿，铺下就是水，跳蚤满铺蹦。

冬天寒风卷着雪花透进席棚，一个个冻得直打哆嗦。

生了病也不让歇工，工头们说：“只要脑瓜硬，就得干活去”！我累病了，半个月吃不进多少东西，也得咬着牙坚持上工。凡是重病号，都抬到18号工棚，放在那就不管了，不等咽气就被抬到铁丝网外半里处的一个大坑，扔到坑里任凭狼撕狗咬。我们都管这个地方叫万人坑。夏季是发病高潮，几乎天天往外抬死人，少则一二个，多则四五个。死亡每时都在威胁着每个人，一年里，在虎头一带，不知有多少中国同胞悲惨死去。严酷的现实使大家感到，即使能活着出去，也得扒层皮。

劳工们不堪忍受这非人的生活，想方设法磨洋工和伺机逃跑，有一天，在江边修炮台的3个青年劳工，乘机跳入乌苏里江向苏联游去，被日本军舰抓回工地。单大马棒当着全体工人面，用烧红的铁条烙这3个人的前胸后背，惨叫声，撕人肺腑。单威胁说：“谁要再跑就和他们3人一样，决不客气。有一个人逃跑，睡在左右的人也要受罚。”说完就给这3个人带上脚镣，赶到工地干活。尽管单大马棒手段残忍，逃跑事件仍时有发生。有一名劳工跑到山里，靠吃野菜度日，在山里转了一个多月，终于逃出虎口，回到沈阳。

1938年秋，我们工棚子一带的活干完了。洞里安上了电灯，弹药库、炮台、交通壕全都完工。一年多苦役，劳工死了一半，侥幸活下来的也是皮包骨，身上的衣服也破烂不堪。日本鬼子把我们这些人，赶进了“瓦罐”车，送回了沈阳、大连。我干了一年半的苦役，给了80元钱，总算脱离了这个地狱。

钱花光了，无处谋生。1942年春天，“大野组”到沈阳去招工，说一天给3元钱，于是我又二次来虎林。这次是在迎门顶子（迎春）一带修警备道，有3000余人，也是住席棚，吃小米、高粱米、大楂子。在齐腰深的水里光着屁股挖草垫子修道。荒草甸

子一望无边，白天瞎忙，晚上蚊子咬，小咬更讨厌，眼睛头皮哪都钻，简直不是人受的滋味。干了一年只给5元钱，还不往回送。发了个劳工证，让在虎林自谋生路。因无法回沈阳，我就拿着这个劳工证，在虎林申工棚子干活。一直到1945年8月光复。1947年，我参加了反奸清算运动，后来参军入伍。

(摘自《虎林文史资料》)

在铁岭修军用工程的 劳工和勤劳奉仕队的惨状

赵 儒

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霸占中国领土，于1944年冬在铁岭城南10公里处，新屯至周安屯一带修建第二个“东京”工程。这个地方三面环山，中间有10余平方公里的平原，“东京”横跨哈大公路，紧靠中长铁路，又有凡河清流，水源充足，环境优美，是个交通发达的好地方。

1944年冬季的一天，日本人开着汽车到周安屯，踏着大雪搞测量。约一个月后，运来了大批木材、钢筋、水泥等物资。1945年刚过春节，日本人开始从各地强征大批劳工，从得胜台车站到新屯、周安屯、黑牛圈子一带，大道上连人带车一个接一个，聚有十几万劳工。在周安屯北山往下看，整个沟里，全是用苇席搭的劳工棚，所有的地都占了，那一年地都没有种上。

强征的劳工分三部分人：一部分是从东北各地征抓来的，南至大连，西至绥中，北至哈尔滨、白城子一带的人。另一部分是建筑公司招来的，公司头头叫大柜，下辖许多把头，把头管制劳工。三是勤劳奉仕队。

日本人为了管制劳工，调来两个营的兵，周安屯南沟住一个营，沟北住一个营。代号4368部队，共有700余人。

施工现场分三处：新屯南山为第一现场，主要是挖山洞；周安屯为第二现场，在村西修飞机场；村东高家坟修造兵所、机炮厂，北山建房屋；黑牛圈子为第三现场，主要挖山洞。

施工很紧张，进度很快。劳工进来不长时间把电就引来了。4月份从乱石山将铁路修到周安屯，并开始通车。在凡河岸边修一个直径十几米的方井，把水引到周安屯元宝山，元宝山下的坑道是日本工兵自己打的，坑里纵横交错800米，时间不长就打通了。

中国劳工们遭到日本人惨无人道的迫害，睡在潮湿的地上，吃的是谷糠、橡子面掺杂碎小米。劳工们在劳动时，不断遭到日本人和二鬼子（朝鲜人把头）毒打，劳动强度过大，得病也不给治疗。所以，每天都有若干劳工丧命，死后用席子捆着由劳工抬出工棚，扔到荒山坡上被野狗吃掉。高家坟修造兵所工地，这个工地全由勤劳奉仕队施工，计有10个大队，约1200人。其中铁岭县大队、滨江县大队、巴彦县大队这三个大队住在一起。今铁岭县一位省劳动模范、原阿吉镇党委书记徐永发，1943年当勤劳奉仕先在黑龙江省做苦役，1945年春调来周安屯高家坟修造兵所，亲身遭受种种苦难，是死里逃生的。有一次下大雨，勤劳奉仕队员往工棚跑避雨，日本人白浪山田要徐永发等一些人“蚂蚁拿太”（让人脸朝下趴在地下，往腿肚子上踩）。奉仕队与劳工不同，勤奉队实行军事化，由“国兵漏”组成。年龄在21岁至23岁。大队下设3个中队，中队下设4个小队，一个大队1200人。每个大队都有一个日本人看管，下有二鬼子工头，对勤劳奉仕队非打即骂（二鬼子为了献殷勤对劳工特别凶残），每天早6点钟起床在操场作操，徐永发本人多次遭

日本和二鬼子毒打。早上8点钟进工地劳动，晚6点才收工，一天劳动12小时。一天到晚累得筋疲力尽。勤劳奉仕每人发一套衣服，一个帽子，一双胶鞋。吃的和劳工一样，谷糠、橡子面掺碎小米。由于劳动强度大，营养不良，滨江县、巴彦县的两个大队到周安屯不到一个月，很多人得了“稀屎痨病”，日本人不给治疗，每天都有一二十人死亡。死一个人，给一桶煤油、两根木头，由伙伴抬到山上火化，有的火化后剩下大腿，有的剩下人头，都扔到山上喂野狗。真是惨不忍睹。

铁岭县大队工地监工是日本人，叫山田，身持战刀，背着枪，非常凶狠，惨无人道，经常毒打勤劳奉仕队员。徐永发等一些入有一次要到山上看火化队友尸体。他说，“背老带”（勤劳奉仕队）死了的没关系，皇军的工程要紧。不让徐永发他们去看。从1945年春天到8月15日日本投降，仅5个月，滨江县、巴彦两个县大队的勤劳奉仕队2400人只剩下600人了。

日本投降后，滨江、巴彦两县，勤劳奉仕队员家属来铁岭找尸体，满山遍野是被野狗吃剩下的人体白骨残肢。北山上响起一片痛哭声，有的家属抱回一个人头，有的抱回一条大腿。村民见此惨状，无不悲痛万分。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太多了。

注：此材料根据王世福和徐永发二人的回忆整理。

（摘自《铁岭文史资料》）

乌奴耳六个月

冯德恩口述 范耀辰整理

伪满时期，我先后3次被抓去做劳工。第一次是在康德9年（1942年）3月，被送到当时的三江省依兰县修飞机场。那次绥中去了800余人，3个月后回来。第二次是康德10年（1943年）6月间，去乌奴耳修军事工程，半年之后回来。第三次是康德12年（1945年）8月间，去吉林缸窑，同去的有1400人。到那里仅五六天，日本就投降了，我们沿路乞讨才回到家。

康德10年6月，上面摊派给我们冯家屯出劳工4名。叫谁去呢？村长便决定抓阄。这一天村里人集合到南面场里，参加抓阄的共60人，都心惊胆战，深怕这不幸会落到自己头上。我因为上次出劳工受过苦，就更加害怕。当我拿起纸阄打开看时，顿时眼前发黑，恶运偏偏又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和冯树恩、冯向清、冯汉清一起中阄了。

第二天集中到县里，共有六七百人，编成了大队、中队、小队。总领队为大队长吴冠三。每100人1个中队，50人1个小队。当时我被编到4中队，中队长前卫人刘某，小队队长是宽邦人焦久新。在绥中住了几天就出发了。临上火车前，有一个官给我们讲了话，他说：“去做劳工是有好处的，是光荣的，能吃饱穿暖，6个月完工就回来，不准逃跑。”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在骗人，既然吃得饱穿得暖，为什么还有人逃跑？

上了闷罐车，中、小队队长就把车门把起来，深怕我们中途跳车逃跑，连大小便都不准下车，人们只得在车上拉屎撒尿，臭

气熏人。从绥中到哈尔滨一段，每天只发给两个馒头，往往吃上顿没下顿。大家饿得慌，到站停车，不顾队长阻拦，争先恐后去买食物。车到江北以后就更惨了，每天两个馒头也没有了。每到停车，争买食品的人更多了，可是车站上除了卖熟鸡蛋的，别的什么也没有。

就这样经过7天7夜才到了乌奴耳。

乌奴耳修的是军事工程，日寇驱使数万人在这里干活，在地上挖有几条很宽很深的壕沟，沟壁沟顶用水泥筑起，上面盖土种草，加以伪装。沟与沟之间有通道。大多数的工作是抬石头，从取石地点到工段有200米远，每两个人一次要抬100公斤，每天要抬够规定的次数，定额很高。如果能够吃饱肚子，还能勉强完成。但是我们哪能吃得饱呢？

本来日本鬼子给我们的口粮就少，加上管事的汉奸从中克扣，就所剩无几了。每人每顿只能吃到窝头两个（约2两多粮），没有菜，每天都饿得发昏，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走路都吃力，更不用说干重活了。

见有完不成定额的，日本监工就去找队长，队长就强迫人们去干，有时天黑了也得接着干，直到完成才回来。对于那些经常完不成定额的非打即骂，对所谓磨洋工的人也是如此。因此被折磨死的不在少数。顾山堡有个姓王的，日本人认为他磨洋工，把他抓了去。刑罚很绝，要他骑在木杠子上，如果骑不住掉下来就打，这样整整折腾了四五个钟头，不到3天就死了。

居住条件更是恶劣。全工地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我所住的是北区，有5000余人，都挤在十几个席棚子里，夏天又热又臭又脏；冬天冷得睡不着觉。

由于饥饿、疲劳和条件恶劣，发病率越来越高。有了病不但得不到治疗和休息，还要被队长和监工逼着去干活，干不动

就打。后来就更残忍了，他们说病号有病吃不多，每顿只给一碗粥吃，于是轻病号也变成了重病号。有一次我有了病，他们只给我一碗稀粥，我忍不住饿，勉强去上工，因为浑身发软没有劲，拍得很慢，日本监工看见了，抬手就是几个耳光，我被打得眼里直冒金花。

在各种残酷的虐待和折磨下，劳工开始死亡，起初每天一二人，以后逐渐增多，每天一个棚里都要抬出三四个去。北区的4个月之内就死了1000余人。尸体都埋在离工地不远的地方，在3里长1里宽的一片地里，埋满了劳工的尸首。沟屯有个姓张的兄弟二人同一天死去，都埋在这地方了。

人们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生活，有些大胆的就试着逃跑，但逃跑是十分困难而又危险的。不用说周围有日本兵站岗，近处有二鬼子监视，根本没法跑出去，就是跑出去，也很难活着回到家里。乌奴耳一片荒凉，几百里以内没有人家，跑出去弄不到食物，也会饿死的。有些逃跑被抓回来的更是遭殃。帐沟子有个姓杨的，逃跑被抓回来，腿打断了。邓吉山逃跑几乎被打死。

逃跑是不可能了，人们就想办法减轻劳动强度。原来监工的里面有很多是二鬼子（这是对为日寇服务的少数朝鲜人的蔑称），他们贪财，有些人就赌博，二鬼子只要抽了头就不大管事。以后赌的人多了，二鬼子得的钱也多了。但这种办法功效不能持久，因为大家的钱有限，钱输完了还得干活去。

大概是因为人死得太多了，各方面都有些反映，出劳工多的几个县份更是如此，他们派人来调查死亡的原因，向日本人反映说是饿死的。日本人不信，他们就会同日本人解剖尸体，结果发现死者的胃里尽是青草和野菜。日本人这才承认汉奸和二鬼子克扣太厉害，把原管理人员全部撤换，改由“关东军”直

接管理。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关东军”在两个月内没有克扣和打骂现象，生活好像改善了一些。

我在乌奴耳6个月，到这年年底才回到家里。

（摘自《绥中文史资料》第二辑）

派往兴安北省乌奴耳的劳工被害写实

狄玉林口述 彭文彬整理

究竟谁去做劳工

伪满时期劳工摊派，每年最少一次，在25岁至55岁之间，是劳役适龄者。我们绥中县凉水河子村村长根据县方所需要人数，按甲分配任务，这正是村长、警察所长、民籍系主任和甲长们发财的时机。伪满康德11年（1944年）春前4月（农历闰月），村公所的劳工任务下来了，凉水河甲应摊8名，通知适龄各户，8天后早7点齐集甲公所，由甲长带队到村公所抽签。通知下到各户后，甲长高仲三等大肆活动起来。每户出80元可以免去劳工任务。这时稍稍富裕的人家，就暗中给甲长送谢礼，据我所知的陈国章给甲长5两大烟土（常在老陈家吸的还不算），王海山给高甲长六斗梗子，这样就可以明着到村公所抽签，暗中免去了劳役。

这次抽签的结果，是我们8名（狄德明、陈国才、董守珍、狄玉林、刘萃林、白元树、刘福荣、狄福林）无力送礼的抽上了，当时狄德明、陈国才抽上了红签，放声大哭，在回家取行李的途中也是泪水洗面，真是使人惨不忍睹。

次日早饭后，由高甲长的自卫团护送我们到前卫车站集合，继由黄奎升、张永清护送全村60余名劳工，坐午间火车到县里报到，经县劳动股验收。然后，全县整编成一个大队，并指派了大、中、小队长。整编后，经过劳动股赵股长简短讲话，我们才知道去乌奴耳，午后4点多钟就把我们装上了闷罐火车，开往乌奴耳。

工地生活

在火车上我们过了4天，这一天的中午到达了乌奴耳车站。乌奴耳街道和我们前卫差不多，也是个小镇，有几百家住户，集镇的四外是旷野荒郊，所有的山也是光秃少树。工地距乌奴耳约有八九里，是个小山沟子。但是，四周和沿路都是日本关东军防守，岗哨很多。

住宿方面：宿舍是用苇席在沟内的小山坡搭成24米多长、3米宽、2米左右高的马架式席棚。两头是门，中间走道，内设距地15公分高的对面板铺。一个席棚，容纳一个中队的人员，除了中队长、大队干部另有方正的棚铺，其余人均在这样马架棚内住宿，夜间非常拥挤，臭气薰人，空气污浊得很。在外边过宿，不但天气寒冷，也是不允许的。人们也不敢在棚外宿，因为周围是旷野、夜间四外狼嚎，只有在这又挤又臭的棚内才是安全。

伙食方面：据说日本侵略者为了早日完成工程，对劳工的粮食发给是足够的，每日一人用量1.8公斤成粮（小米、玉米面等）外给一角钱菜金。又因是笨重体力劳动，补助了部分土豆作菜。结果这些东西都不翼而飞，到劳工嘴里的一日三餐，每顿两小勺的小米、土豆稀粥。不但没有菜吃，而且连盐水也没有。

这里的水是非常珍贵的，出去1公里左右用轱辘马拉水，水是浑浊的，还有虫子，就这样劳工也别想喝一滴水。人们日久也就习惯了，又因吃不着盐酱，喝的是约有一两多米的小米土豆粥，这样也就不想水喝了。

我们主要是在那里修山洞子。我们中队负责供料，两人一辆轱辘马，由山下往山上运沙子、洋灰、铁筋……沿路不但有中、小队长监工，而且还有由关东军派来的6名朝鲜人监工，每天手持大木棍，像凶神恶鬼一样，谁要稍一喘息，随即棍棒加身，并且扣除当日的伙食。因为如此，狄德明到工地未满一月就死了，而后董守珍也悲惨地死去。劳工们编了两段歌谣：“饭内水多粮食少，劳工数多席棚少，得病人多好的少。”“屋中蚊子多，水中虫子多，病人死的多。”

因为生活条件差，人们活计累，吃不饱，工人们来后未到一个月，就有人把被褥卖光了。那里的东西贵得吓人，每个重2两的窝头，价格3元伪币；粮价每斤26元左右；一床被子（八成新的）20元钱，一床褥子（八成新的）10元钱；一件棉袍8元钱，同去的陈国才一被一褥换了10个窝头。工地上只有几个日本医生，是为了防疫而安置的，捎带着给工人治疗。但是他们不懂华语，更不把工人当人看待。经他们检查，患病轻的说你没病，患病重的就认为是传染病，立即抬往隔离室。人到了隔离室，九死一生。隔离室也是对面炕，里面苍蝇扑面，几十个病人躺在炕上，根本没人管。病人想喝口凉水都没人递给。病重者，日本人马上就叫人拍出掩埋，恐怕得的是传染病。我们屯的董守珍就是带着活气被抬出去埋的，那情景真惨呀！

工棚子失火

每个月，日本侵略者发给一人一盒纸烟、一两白酒，但是

这么一点有限的东西，也被监工们克扣了。酒被他们私卖给游牧的蒙民，烟又加价卖给劳工，每盒伪币1元。

旧历5月间的一天，人们吃完午饭，排队又都上班了，不大功夫，有人招呼绥中大队的劳工回去救火。原来病号室失火了，病号室的一个轻病号在棚内吸烟，误把烟头掉在板铺的草上引起火灾，室内又没有水，救不及时，所以殃及整个棚子。监工的朝鲜人大发雷霆，将大队劳工召集在一起，他们逐个打病号，叫其他人观看。这个滋味真叫人心酸。

打完人，督工的又命令劳工们在一小时内完成搭棚任务。新棚搭好后，朝鲜督工恶声命令病号回棚里去，病较轻的，手拄棍子一步三晃地往里走，病稍重的只能往里爬行，最重而又被打的陈国才等人，实在不能动了，才许可我们大家把他背进病室。而工头们却有说有笑地扬长而去。

我把陈国才背进病室，放在床上，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眼角含着泪，有气无力地叫了声：“五哥！”就伤心地闭上了眼睛，再也说不出话来。这时外面又催着劳工们上班，我只好安慰他几句忍着悲痛走向工段。

次日早上醒来，刘福荣从工棚外面进来对我说，“五叔！刚才陈国才被抬出去了。”他再也讲不下去了，我们二人相对而哭。人们得到这个噩耗，全都落下了同情的眼泪。

工程延期

人们在乌奴耳度日如年，当6个月期限快满的前几天，人们的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在睡觉做梦中也见到了家乡和自己的亲人。结果事与愿违，在满期的前一日，大队长招集全体劳工训话，因为没完成工程任务，上面指示延期1个月，人们听到这个话，回家的美梦又破灭了。人们心中都有这样一个问号，

1个月后我们能不能回家呢？假如再延期怎么办呢？我们就得全都追随陈国才去了。这个期间，人人心中害怕，个个怀着恐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忍着吧。由于愁苦不堪，很多人病倒了，我也得了头昏病，刘福荣、狄福林、刘萃林得了浮肿病。又熬了1个月，这一天大队长发布了命令，叫大家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因为我县完成了工程任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心差点跳出来，都高兴地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这个人间地狱。当日的午后就到了乌奴耳车站，坐了3天火车，在旧历九月二十七日终于回到家乡。这次全村去劳工60余名，回家来40名，死了1/3。

强迫战俘劳动纪事

（日）大西馨

在工地的山冈上建立的军官室内，我把值班做的家常饭当作下酒菜，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喝着酒。忽然，我向窗外扫了一眼，看到在远远的山冈上大约有200名男人朝这边走来。“啊，这群家伙来了。”我心里这样想着，点了一下头。我再仔细看看，发现他们也不戴帽子，衣服破成碎片，到处露出肌肉，甚至其中还有摇摇晃晃扶着同伴肩头来的。我皱起眉头：“用这群家伙能完成任务吗？”真让人担心。但是，我马上又想：“那怕什么？另外还有100名农民呢，到哪儿这群支那人还不是听我的指挥？就是杀他一两个也没有什么关系。”想到这里，刚才的忧虑就烟消云散了。

这群男人是抗日军俘虏，从5月开始，半年的时间，都在铃木中队干活。他们在潮湿地带修起了公路。前天，铃木中尉还

得到在现场检查的军司令官饭村中将的表扬：“干得很好呀！”这群俘虏在千叶高地埋葬了他们200个战友遗体后，便被分配到我这个中队。今天，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来了。

收容俘虏的是一间长长的屋子，这大约是10天前完工的，中间有条50米长、1米宽的通道，两侧是2米宽的睡炕，铺上的干草虽然是新的，但是居住条件比牲口棚还差，既没有光线，通风也不好，是一间很简陋的长条形屋子。他们睡觉时已经过了半夜，每人裹着半条毯子。明天大概休息。正当他们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脾气粗暴的日下部军曹带了两个佩剑的士兵，在不透气的长条屋子里像在枕边那样高喊道：“喂，起来，今天就要上工！”俘虏们皱起眉头，在这个说不定会干出什么坏事来的气势汹汹的军官面前，大家尽力保护住自己疼痛的身体，站了起来。

“喂，吃饭啦。迷迷糊糊地打瞌睡可就连去厕所的时间也没有了！”日下部喊着。但是，拿出来的食物是在空罐头盒里盛上的一把高粱米饭，没有菜。俘虏们互相对望了一下：“什么？一直喊着吃饭、吃饭，这就是吃饭吗？让我们吃这样粗糙的饭食，那怎么干活呢？”俘虏们满面愁容，也只好拿起筷子吃饭了。这样还不到几分钟，我们就催着正在大便的俘虏，把他们带到后面的石山上去。在那里，让他们把挖出来的石头装到台车上去。

“北满”之冬，天气非常寒冷，刺骨的寒风从四面八方朝这个山丘吹来。“把石头装上车！”在浅川中尉命令下，俘虏来搬石头。但是，因为没有手套，怎么也不好干，俘虏们不由得喊着“冷呀”，把碰上石头的手缩回来。伙伴们互相对望着的一瞬间，“干什么这么迷迷糊糊的？躲开，只有这么点儿石头。看着，像这么干。”水田兵长用戴着防寒手套的手抱起石头装上车。他抓住一个俘虏，狠狠地连续抽打那俘虏的耳光，然后便快步到

下一辆台车那里去了。被打的俘虏气呼呼地瞪着水田兵长的后影，但是不久，就默默地开始装车了。

“从最前头的车开始出发！”长滨上等兵喊道。排头车的四个人手扶着车框，在零乱的弯曲的轨道上小心地推着。那里有一个急剧倾斜的坡，台车像箭似的飞去。长滨上等兵又急忙喊道：“喂，从这儿下去得有一个掌舵！要是不灵活地刹闸，就会脱轨摔坏车子，得注意啦，喂，明白吗？”

四个俘虏担心地看着。“果真如此，这是一条杀人的道路。竟让我们干这样危险的事！”他们都气愤得瞪着眼睛。不久，选中了一个年轻人，其他三个人都一边走一边提心胆地屡次回头看看。年轻人代替那三个伙伴插进了闸杆，猛地使劲，检查刹闸。不一会儿，狠狠咬紧嘴唇，拼命注视着前方的轨道驾驶起来。在像箭一样飞驰的台车上，他使足了全身力气刹住闸，跑下了斜坡。以后的俘虏也学着这个样子，提心吊胆地逐个下到正道。在这杀人的场所，稍一疏忽，闸环脱落，就有脱轨摔下去的危险。不死也会重伤，我却满不在乎地丝毫无动于衷。

在正道，四个人咯吱咯吱地推着车。这附近是一无可取的潮湿地带，看不到人影，但是两年前的梅津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下通过国境的10米宽的大道，是耗费2万多中国人民的血汗修筑起来的。现在，在附近大姆凌河的运河，中国俘虏又在肩上挑起装满土的变成漆黑的麻袋。

发出沉重的吱吱声音跑着的台车，突然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脱轨了。四个人一面骂着畜生，一面看着轨道弯曲的方向，赶快抓住车身，想要拖转上来，但是已经晚了。这时，下村曹长飞跑过来：“喂，磨蹭什么？那样干，车子上得来吗？”说着，用手中的军刀刀鞘朝四个人的背上、腰上任意打去。两个俘虏抽回扶在台车上的手，使劲瞪着下村曹长。下村曹长看到这种气

愤样子，害怕得往后退了一步。此时，旁边台车的三个俘虏急忙跑了过来，一边劝解同伴，一边费劲地把车推上了轨道。台车行列又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前进了。骑着马看到这种情况的浅川中尉大喊道：“喂，再加把劲，别慢吞吞的！”

推着台车的俘虏，下半身满是疮痂，连皮肤颜色都看不清了，每推车走一步，由脓变成的硬疮痂就被棉裤蹭破了，露出鲜红的肉来。俘虏极力忍耐着痛苦，拼命地推着车。但由于浅川中尉呼喊，士兵们仍靠近车旁催促着说：“再加把力推呀！”

再三努力，才勉强到达有12公里远的目的地。“喂，卸下来！”连口气也不让喘，卸下石头，然后就在露天开始吃饭。他们穿的棉衣只是形式上的棉衣，从破烂的布片当中露出了棉花。有的人只好裹上毯子和水泥袋。吃的食物，只是一把高粱米饭，还是盛在挖土的铁锹上，在寒冷的天气里哆哆嗦嗦地吃。在那里，到处都是极度不满和气愤的声音，但是，暴风雪把那些声音压下去了。日本兵则用皮帽子盖着脸，穿着臃肿的皮外套，在屋里喷香地吃着烧好的饭。

“喂，吃完了的人去割明天烧饭用的野草。”下村曹长嘴里塞满饭，一边大口吞食，一边大喊着。“这个混蛋要把我们驱使到什么程度才甘心呢？”俘虏们这么想着，气愤地把视线投向下村曹长的脸，拿着镰刀到湿地里割野草去了。这样迎着暴风雪，疲劳的伙伴们一起装好收割的野草，回到长条形的屋子已经是傍晚了。但是，一个空罐头盒子的高粱米饭，对于要满足空着肚子的饥饿来说实在太少了。

“哼！”

“起来肚子更饿。”

俘虏们就这么穿着棉衣，裹着一条半单薄的毯子，滚在野草当中。但是，化脓的伤口针扎似的痛着，很难入睡。他们就

这样一夜也没合眼，熬到了天亮。屋外，从半夜开始下的雪埋住了轨道。

“今天让休息一天吧。”张中校请求说。

“作业进度比预定迟了，明天如果在一天之内能干上两天的活，今天就让休息。”镰田中尉对张中校提出的请求加上不可能的条件，冷淡地答复道。

“那么，请你把台车减少到30辆吧，如你所知，病人多，又是大雪。”张中校又要求说。

“我没有这个减少台车的权力。”这样说着的镰田中尉，把这个理所当然的申请也给顶回去了。

我准备在三义屯建设根据地，大约10天一次到现场去露露面，每逢去的时候便抓住士兵说道：“你们，可不要比南方战友们的干劲差。可不能让这群家伙看到我们的弱点，对不好好干的家伙要严加督促，对他们的性命是无需考虑的。”这些话是我的口头语。我的话果然见效，尽管从健康直到气候和工具都很恶劣，作业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我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因讨厌工作而进入军队，有带水印饰章的任命状和闪闪发光的肩章，便飘飘然忘乎所以。“是啊，认真地干可以领到养老金，老了可以安乐生活。”我是这样决定一生方针的。为天皇和三井、三菱^①忠实地效力，并且把别人的功劳也算在自己的帐上，这是保证我飞黄腾达和养老生活的条件。为此，要让这群俘虏忍受多大的辛劳和过着如何悲惨的生活呢？

我就是这样，使60多个俘虏由于营养失调和皮肤病而成为残废人。街上明明有陆军医院，但是我从来没有叫一个人去住院，只是让滨野卫生兵潦草地治一下伤。每周到这里来诊疗一

^① 三井、三菱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军火工业财团——译者

次的井本军医，忙得直喘，叫俘虏脱下衣服，但只是在皮包骨的身体上用手按一下肩膀便说：“嗯，好。”他一次也没用过听诊器。“什么看病，糊弄人玩！”病人嘴里这么说着，痛苦地勉强穿上衣服。

“井本君，他们好像是非常痛苦。”我这样说着。

“不，他们这些支那人，领导人一来，就故意这样夸张地呻吟。”井本说道。

从睁大眼睛瞪着我们呻吟的病人那里和充满恶臭的长条形屋子里，我和军医慌慌张张地逃了出来，靠着军官室的椅子，开始谈起虎林高级饭馆的传闻。

那天晚上，在长条形的屋子里，分别在江苏省和安徽省有父母、妻子的姓黄和姓曹的两个人，怀着强烈的仇恨，睁大眼睛咽了气，谁也没有注意到。饥饿和寒冷，繁重的艰苦劳动，再加上病痛，除死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呢？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拼死跑过警戒线，从这间杀人的长条形屋子里逃出去。眼看着有很多同伴死去的俘虏，选择这条道路是当然的。可是我得到这个报告后却感到窝火，直跺脚。没有办法，只好通知虎林宪兵队。然后，我生气地对担任守卫的梅本军曹和江藤伍长说：“喂，要好好地警戒！”我开始担心起来。

大约是过了10天左右，四个俘虏在虎林西方的村子里卖毯子时被宪兵队员逮捕，给送来了。我正气得没有办法，马上命令道：“为了儆戒今后，把他们都绑在警卫室的柱子上！”饭也不让好好吃，把他们像狗崽子还是像什么似的绑在柱子上了。不久，军司令官传令“判决死刑”。我流露出满意的微笑，但增加了仇恨，心想：“用什么方法杀掉他们呢？”我也曾想为显示自己而砍一个头试试，但又想：“等等，如果砍这些家伙用的刀卷了刃，那可让人笑话。”我命令浅川中尉把他们枪毙。

“下次再也不逃跑了，从明天起让两个人去运石头。请饶了我们吧。”俘虏恳求着。但我对杀人抱有最大的兴趣，当然听不进去。

“事到如今，不要再说蠢话了。喂，为了警戒大家，叫全体俘虏参观！”我发疯似的喊着。于是，在浅川中尉的指挥下，让清武军曹等7人对此负责。他们把子弹咔嚓咔嚓地装了进去。有一个俘虏用严肃的态度对我要求说：“不要蒙眼睛，你们来打吧。”但是我想，让临死的人瞪着，以后会感觉不好，就说“不行”，把他这么一个最后的要求也拒绝了。

“队长！可以了吗？”

“可以了！”

“打！”在浅川中尉号令下，七发子弹，把泰然自若地嘲笑法西斯的俘虏吧嗒吧嗒地给打倒了。他们最后的大声呼叫，在平缓的山冈上回响着。我们走近四个人旁边所看到的，是嘴边带笑的俘虏在鲜红的血泊里从容咽气的情景。“在临死的时候还是些非常不错的家伙。”我带着这样的感觉，马上转过身去。

“今后，你们在逃跑之前必须先想想今天的情形。”我站在俘虏们的面前说道。他们因战友们被残酷杀害，愤怒和仇恨的感情正在沸腾。我只留下这句话，对尸体的处理也没有做指示，就回到军官室去了。

我接管第45野战公路队以来，就这样让他们劳动，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把自古以来世代希望在自己的肥美土地和平劳动、父子兄弟和睦生活的人们残酷地杀害了21人，此外还使50余人成了残废。这种罪行只不过是我罪行中的一例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召集中国人民在日本士兵的监督下进行繁重的劳动。是东条他们的主意，而我们是唯他们之命是听的部队。我为什么成了这么一个大糊涂蛋呢？这是因为，我认真

地接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教导，并以此为光彩、为荣耀，而且认为这是自己飞黄腾达的唯一道路。因此就把什么罪也没有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杀害了，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真是难以估计的罪恶。

本文笔者简历

原籍：爱媛县

学历：高小毕业

出身阶级：贫农

所属部队：第42野战公路队

年龄：47岁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8月）

1956年秋，我在舞鹤登陆回国，住院一年多，治愈后在造纸机械制造公司工作，到退休年龄退职，后来在大成化工建材部工作。再退职后，在附近的制材公司再任职。1978年，随着公司倒闭而离职。其间，为了耐心疗养而住院近两年，又因为遇到交通事故而住院约三个月，而且还因右手指被切断四个而住院，等等，真是坎坷的后半生。

现在，我一边耕种10公亩果园和10公亩菜园，一边担任川之江宣传委员，农协理事，残疾人团体理事，姓氏总代表，军人养老金协会董事，老人会董事等，以尽微力。这当然是站在对过去在中国所犯罪行赎罪的立场，特别是考虑到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正确地生活，于是为中日友好、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活动。

我的兵种原来是工兵。在“苏满国境”有广阔的潮湿地带，需要有作战用的公路，所以创建了公路队。在这里，日本军队

人少，当然就要使用中国人修筑道路，于是把他们组编装备起来。从化雪的4月到8月，用“勤劳奉公队”的名义，率领从东北各地集合来的农民，把湿地的泥土垫高，修成公路。从9月起运砂石铺筑路面，是使用中国战场上的俘虏，这个手记所述就是当时的情况，是我的反省记录。已经过了将近30年，凭记忆叙述的内容已经淡忘了，但是，对于中国各位国民来说则是难以忘怀的痛恨事。我由内心表示歉疚。战争必须极力避免，尤其是侵略别国，绝对不行。但是，如果受到别国侵略，那也必须站出来保卫国土。

（大西馨）

（摘自《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